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史金波

史金波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SHIJINBO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史金波

史金波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SHIJINBO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BB1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金波文集/史金波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802-1

I. 史... II. 史... III. 中国—古代史—西夏(1038~1227)—文集 IV. 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652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许仲毅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史金波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0.25 插页 8 字数 489 800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6-1802-1/K·315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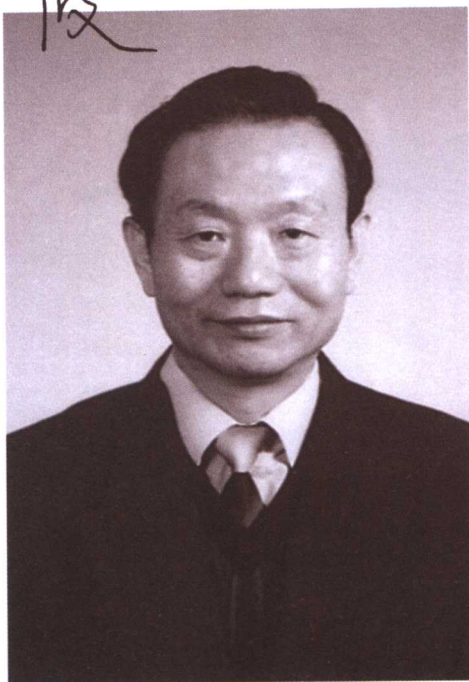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史金波



史金波

小传

史金波,1940年3月3日生,196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民族所工作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兼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理事等职。曾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理事长、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出版著作20种(包括合作),主要有《文海研究》、《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物》、《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类林研究》、《西夏天盛律令》、《西夏用兵史话》、《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版第1—11册)、《西藏人权研究》、《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昭觉县彝族卷》、《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少数民族古籍版本》、《西夏出版研究》。发表文章180余篇。曾获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荣誉奖、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郭沫若史学奖二等奖、光明杯奖、西北五省区优秀图书奖。

自序

当出版这本个人文集之际，似应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番回顾。我是一名民族历史、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研究范围侧重于边远民族地区，主学古代西夏文史，则更显边缘、遥远。我从一个农村出身大学生步入西夏研究行列，纯属偶然。

我祖籍河北省涿州市，自幼生长在涿州以南的高碑店。这里属华北平原北端，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民风朴实，豁达仗义。战国时荆轲刺秦王之前与燕丹辞别的易水，在我家西部。我家北面是三国刘备、张飞的故乡。踏遍千山万水撰写《水经注》的酈道元、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唐朝著名诗人卢照邻、佛教禅宗南宗祖师慧能、陈桥兵变后做了皇帝的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籍都离我家乡很近。这里是宋、辽边界，我家北面祁沟一带还有当时因双方对峙而挖掘的地道。元代高碑店是大都通往保定的必经之路，著名宰相安童和拜住祖孙皆葬于此，记述他们事迹的高大墓碑民国时被毁，但由此而叫响的高碑店名称却遗留至今。这里虽远离西夏，但南面保定郊区的寺庙遗址中还发现了明代西夏文石经幢，那是西夏后裔消亡前最后的历史见证。清王朝的西陵离高碑店仅几十公里，埋葬着清代四位皇帝和他们的后妃。清末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高碑店是中心之一，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就是高碑店人。我就从这块土地上求学并走向人生之路。

一、求学之路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都勤劳、朴实、正直，特别是在解放前后当地群众还不太重视教育、家里生活很困难的时候，父母执着地供我们五子女上学，在当地甚为少见。因解放前夕的战乱，我上学较晚。1948年解放后才在高碑店小学读书，1952年考上南面邻县定兴县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北面涿州第一中学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彝语。我在学校学习成绩总在前列。因家庭生活困难，6年的中学都由国家给予助学金，解决伙食费的大部开销。读大学时学校管吃、管住，有时还补助棉衣。若无家长支撑、政府照顾，我难以持续求学。

在大学期间，主课是彝语，在李民（汉族）老师和保伍阿什（彝族）老师口传笔授的辛勤教导下，天天朗读、背诵彝语单词、句子和课文，常读得嗓音沙哑，嘴角流白沫。可喜的是这种强化学习使我们进步很快。1961年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实习快结束时，我已说得一口流利的凉山彝语，并能为当地召开的县人代会作翻译。

凉山实习使我最难忘却。在学校就知彝族地区生活条件差，那里直至1957年还保留着世界上少有的奴隶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1957年实行民主改革后，残酷的奴隶制已被废除，奴隶翻身成为主人，但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则非朝夕所能为。我们1961年到大凉山实习时，那里的艰难困苦之情连我这农村出身不畏吃苦的人也大出意料。

凉山腹地山高路险，群众以洋芋（土豆）为主食，每日两餐，皆为煮土豆蘸辣椒汤，除非婚丧嫁娶和年节，天天如此。包谷、燕麦等都属细粮之类。住房多是土打墙，房顶铺设木板，上压石块以固定。

房中靠右是火塘，旁有三块石头支锅做饭，火塘旁是主人睡眠处。他们多无被无褥，和衣而卧。屋左边关养牲畜，用栅栏使人畜隔开，实际上人畜仍同住一室。牲畜之上用木棍搭起一平台，称之为“楼”，楼上存放杂物并备客人居住。我的房东是兄弟俩，我在他们住房的楼上蜗居半年，每晚身下有十数只羊与我同眠，不时能听到咩咩的叫声和咳嗽声。冬天很冷，屋里屋外几乎同一温度，时常在零度以下，雪花能从屋顶木板缝隙中飘落到脸上。天热时则腥臊并起，气味难闻。那里虱子之多令人咋舌。晚上身痒难耐便和主人一起把衣服脱掉，在尚有余火的火塘上抖搂，能听到群虱掉落于火塘中吧吧的爆裂声。当地贫困老乡往往一件披衫或披毡都要穿若干年，甚至穿一辈子。他们一般没有鞋子，天寒地冻也赤脚行路，有的脚底冻出大裂口。在这里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也得到净化，让我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强烈感受到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责任。

当时我们参加农田劳动，参与乡村基层工作，同时在劳动、工作中学习语言，记录语言资料。记得一次背着几十斤洋芋爬山过涧帮助老乡去交公粮，一路上向一位老人学习彝族格言(尔比)时，老人边走边教我，不小心滑倒，筐里的洋芋滚了一坡，大家都帮助他满山遍野地拣洋芋。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低，实习结束时，所有人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这里的彝族老乡非常淳朴、勤劳、聪明。他们翻身后由衷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尽管他们有的人以为共产党也是一个人名。这里特殊的经历使我萌生了与少数民族割舍不断的情结，在此后的岁月中，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我未敢忘怀处在困难之中的少数民族同胞。

1962年大学毕业前我面临着一次选择。当时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和系秘书易先培老师动员我们彝语班的同学报考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文研究生，只招收1名。当时

我年纪较小,很想继续深造,但上学难以挣钱养家,而家庭确需我帮助,思前想后,难下决心,便征求家里老人意见。家里回信说只要国家需要,你愿意上学就继续上,家里生活不要担心。老人虽然没有文化,但这样全力支持的态度扫除了我报考研究生的顾虑。最后我有幸成了中国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从此步入西夏研究行列,竟与西夏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二、走进西夏

如今报考研究生皆预作准备,对专业、导师、前景摸得一清二楚。当时我报考研究生是响应号召,对导师和西夏文专业浑然不知。入学后得知导师王静如先生是国内外著名西夏文专家。后了解到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重要王朝,但元代修史时只修《宋史》、《辽史》、《金史》,而独未修西夏史,所留汉文资料甚少,而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文献因西夏文是死亡文字,尚难以解读,且大部流失海外。于是暗下决心,一定克服困难,学好已经死亡并失传几百年的西夏文,为继承和弘扬这份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我始学西夏文时,西夏学专家们在六千多西夏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得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在导师王静如先生的指导下,我从抄写西夏文书籍入手,学习、记忆西夏字的形、音、义。王先生让我抄写一本有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书,是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第一学期就熟记了书中1000多西夏字,同时还利用有限的资料揣度西夏语语法,完成了《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的论文。学习死文字需付出极大精力,当时我每天都用大部分时间琢磨这些繁难的符号。后对西夏文字逐渐熟悉,死亡的西夏文字慢慢变得鲜活起来。我对西夏文字及相关的知识产

生了更大兴趣，渐渐接近国内最好水平。

过去一般认为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仅有七八个西夏洞窟。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和王静如先生交换意见，认为西夏占据敦煌近两个世纪，敦煌的西夏洞窟可能不止这几个。于是1964年他们共同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两位先生负责，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为顾问，常夫人李承先先生负责具体组织。我作为研究生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实地考察，王先生的助手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同志也参加了考察。这是一次由艺术研究部门与民族研究部门开创性的合作考察。考察组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有关洞窟进行综合调查。我负责抄录、翻译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那时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关系良好，我们每天拿着大串的洞窟钥匙，想看哪个洞窟便打开哪个洞窟。现回想当时情景，确实受到特殊礼遇。那时我终日徜徉在敦煌艺术殿堂之中，领略千年艺术风采，并为其艺术魅力所陶醉。我在各洞窟中仔细寻找，认真抄录题款，对发现的近百处西夏文题款翻译后得知，有些是确定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考察组利用西夏文、汉文题记进行分析，从壁画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两窟群共有80多个西夏洞窟！这一惊人的结论把大批西夏洞窟及其壁画、塑像呈现给世人，大大改变了对敦煌洞窟布局的认识。这些成果不仅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西夏学增加了重要内容。

1965年正当我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所里派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四清”尚未结束，“文革”席卷而来。西夏研究被迫停止，本来中国已落后于国外的西夏研究，差距越拉越大。1970年在下放到河南“干校”期间，我当了一年泥瓦匠。林彪折戟沉沙后，我料

到中国一定会由乱到治,学术研究迟早会开展起来。因此 1971 年便乘探亲之机,将过去北京图书馆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一套《辞源》,带到干校。《西夏文专号》中有西夏重要文献的介绍和研究,有西夏文献的原件和录文。我每晚在二层床上落下蚊帐,躲在里面悄悄学习,抓紧时间恢复业务。1972 年回京后,我即开始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面查找了解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一面裁剪普通纸制成卡片,抄录汇集资料,编辑西夏文字典。国内藏西夏文文献以北京图书馆为最富。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看书要有参加“批林批孔”的介绍信。我便从所军宣队那里开具介绍信,在北图用了近 3 个月的时间系统地阅读、整理馆藏 100 余部西夏文文献,全部作了卡片,并抄录、拍照了部分资料,扩大了识读西夏文的范围,进一步熟悉了西夏语语法。当时我还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搜集西夏资料。1974 年在当时仅存的两三种学术刊物之一的《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学术论文,得到夏鼐先生的支持和好评。那几年的“地下”工作,为后来西夏研究打下一定基础。“文革”耽误了一段学术青春,甚为可惜,我从中找回四五年的学术光阴,也是不幸中之幸运。

1975 年遭遇“文革”重创的学部恢复业务工作。我在协助老主任组织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的同时,正式与同事白滨从事列入计划的西夏研究工作。当时听说保定发现了西夏石刻,便和白滨一起到保定调查,勘查出土西夏文经幢的寺庙遗址,访问当地群众,在莲花池公园为经幢拍摄照片,回京后翻译、考证。原来该经幢是西夏灭亡 200 多年后部分居住在保定的西夏后裔所建。这一考察和研究成果将西夏党项族后裔的历史延续到明代中期。

1976 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极不平凡。1 月周总理去世,举国哀悼。不久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白滨本有全面考察

西夏故地之计划，此时乘机外出，走向西夏。我们从北京出发，路经山西太原，发现了西夏钱币；入陕西，在西安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西夏传递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马牌”和皇帝御制的泥金写经等珍贵文物。从铜川入陕北，自延安向北进入西夏故地，一县一县地考察。我们在米脂县访问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寨，这里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家乡；在靖边县踏察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第一个政治中心夏州遗址，史载这里的城墙是糯米汁夯土筑成，劲弩不入；在横山县观摩了小小的博物馆，里面竟有不少西夏文物。我们从定边过盐池，进入宁夏，这里到处都有西夏的遗迹。银川市是古代西夏首都兴庆府，城内存西夏早期建筑的承天寺塔，西郊有规模宏大的西夏陵园，贺兰山下有形影相吊的拜寺沟双塔，黄河青铜峡岸边有一百零八塔阵，北部有出土很多文物的省嵬城遗址……这些都是西夏历史的见证。

河西走廊是西夏重要的一翼，走进甘肃以后，在兰州参观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省博物馆，在武威进山考察了曾存储多种西夏文物的下西沟岷山洞，在张掖瞻仰了西夏始建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卧佛，在酒泉发现了已经成为垫脚石的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后来我们到了久已向往的西夏黑水城遗址，这里不仅有动人的神秘传说，有荒凉寂静的风情，还曾出土过震惊学坛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

我们除在西夏遗址、博物馆、文管所、图书馆考察文物、查阅资料外，还经常出入各地的废品收购站，翻找废品麻袋，搜集、拣拾有关文物。在“破四旧”的氛围下，那时的废品中常能见到文物精品。我们在宁夏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中曾发现一件精美的唐代铜镜，后交给了博物馆。偶尔也能从废铜烂铁堆里拣出西夏钱币。有时半天扒几麻袋碎铜器，手指都磨出血来。

一路上我们充实着西夏的知识,为得到这样多有形无形的第一手资料而兴奋异常,为华夏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激动不已。在西夏王国跋涉3个月有余,心情复杂。继周总理去世后,小平同志遭到批判,6月朱老总辞世,9月毛主席撒手人寰。7月唐山大地震,我妻子和女儿在离震中不远的河北省三河县,妻子所在的学校被震得房倒屋塌,一位女教师被砸死。我当时远在西北,为近距离触摸西夏、搜集到大量历史资料而感到充实,同时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为亲人的安危揪心。

三、学海求知

研究西夏有两大难题。一是历史留下的资料稀少,二是西夏文献难以解读。这使西夏王朝的历史若明若暗,蒙上神秘色彩。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一部分,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研究西夏对完善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知识,对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我接触西夏,从认识模糊到自觉,再到全身心投入,兴趣逐渐浓厚,感情逐步升华。西夏学是一多学科研究对象,我的研究经历是从西夏文字、语言入手,涉及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因此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进步的过程。

“文革”末期,在科学院图书馆看到苏联西夏文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书中有西夏文刻本《文海》全部影印件。《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对每一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才完成译文初稿。后来两位同事白滨、黄振华陆续参加工作。我们将译稿油印三十份,按条裁剪,做成数万张卡片,以字系条,分字排列。这样同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现多少次,就会有几张相关卡片汇集

一处。这有助于校勘字形,更有利于确定字义,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

西夏文字构造是国内外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自20世纪初有关学者首倡“偏旁”说以来,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偏旁”入手分析西夏字。此说对认识西夏字构造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局限性,它难以概括西夏字的解析。在全面分析《文海》资料的基础上,我对数千西夏字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60多种文字构成方法,综合出西夏字构成基本为合成法,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后在很多涉及西夏文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西夏展览中都采纳了合成法构字体系。

我注重西夏语法的探讨,因为只懂得字义,不谙悉语法,仍难翻译西夏文文献。我发表了数篇研究西夏语语法的论文,提高了自己翻译西夏文文献的能力。在《西夏语的存在动词》论文中提出西夏语多个“存在动词”的区分和使用方法。原来西夏语表示存在的“有”非只一个,在西夏文献中与汉语“有”对应的词很多,在未弄清楚它们的特点和用处之前,显得杂乱无章。我从积累的上千西夏例句中反复琢磨,并借助有丰富存在动词的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总结出西夏语中有表示固定的“有”,表示内中的“有”,表示附着的“有”,表示并列中部分的“有”,表示所属的“有”,表示珍贵的“有”等,使很难理解的语法现象得到梳理、解释。由于西夏文字和西夏语法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我开始翻译和考释没有现成译文对照的长篇西夏文文献,并陆续发表论文,如《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在一段时间内,我对西夏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渐有心得,并撰写论文。可惜关于西夏语言研究的计划因研究方向逐渐侧重文献而未能达到预期。

我以为在研究西夏文字和语言的同时,利用可翻译西夏文的能

力,译释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对促进西夏历史和文化研究更具重要意义。

我利用研究西夏文献所得新资料,结合汉文史料和出土文物,于1986年出版了《西夏文化》一书,对西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儒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分类探讨,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并归纳西夏文化特点,目的是尽可能利用西夏人自己记录的资料,使读者简明地了解真实的西夏文化。

西夏信奉佛教,佛教对西夏历史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之学问。为探究西夏佛教,我在研究生期间就自习佛教知识,阅读佛教发展史、佛教思想史书籍,还诵读数部佛典。我登门向佛学专家王森先生、郭朋先生请教,把所写文稿请他们审阅、修改。后来利用丰富的西夏文献资料,写成《西夏佛教史略》,于1988年出版。佛学泰斗赵朴初先生欣然题写书名,使拙著增色。但当时未能全见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唯恐挂一漏万,谨以“略”名,俟以后补详。书中将西夏法典中管理道教机构“护法功德司”,理解为管理佛教机构,后此书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时更正,并由此始知西夏有道教管理机构。

由于西夏史料匮乏,西夏文物在西夏研究中占居重要地位,但学术界对新发现的西夏文物并不熟悉,我和同行白滨、吴峰云利用多次考察所得图片,于1988年出版《西夏文物》一书,分建筑、绘画、金石、铸造、木竹器、陶瓷器、世俗文献、佛教文献八类,刊布了400多种重要西夏文物图版,各图版都作解释说明,此书可能使更多的读者看到了形象的西夏。

我注意把西夏语言中的材料利用来研究西夏社会现象。比如我撰写的《西夏语中的“买”“卖”和“嫁”“娶”》一文,考证西夏语中的“卖”和“嫁”是同一个字,“嫁”由“卖”转变而来,佐证西夏盛行买卖婚姻。而这些词在西夏语和彝缅语言之间还有语音对应关